

特稿 82

当七一八成为798,当798回顾七一八。同样的位置和空间,历史和现实在这里激荡,工业和艺术在这里交汇。透过一个展览,一段外人甚少知道的工业历史,被重新打捞;一个个普通工人在时代大潮中沉浮的故事,被重新讲述。



798 里的“七一八”故事

本报记者 周有强

他决定开始收集这些“工业艺术品”。

“一定要展现给大家”

七一八厂最具标志性的建筑是锯齿形屋顶的厂房,被称为“包豪斯风格”。这种风格产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,主张适应现代大工业生产和生活需要,讲求建筑的功能、技术和经济效益。

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,这种锯齿厂房的设计也很独特,建筑的窗子全都朝北,这样就可以保证室内的光线均匀,以免有阳光的地方特别亮,没阳光的地方特别暗。厂房的屋顶是弧形的,叫“薄壳屋顶”,最薄的地方只有6厘米。

63岁的庞成奎正站在“薄壳屋顶”下,给参观者们讲解着。眼前的他一身黑色西服,头上戴着一顶印着中国国旗的黑色棒球帽。说起七一八厂的建厂史和当时职工的精神面貌,他如数家珍,真诚动容。

也难怪,从17岁进入七一八大院,到60岁退休,再到现在被返聘回来,他在这里待了整整46年。从车间铣工到获得“新长征突击手”并受到华国锋接见,从结婚生子到升任所在的第十一研究所党委副书记,从目见七一八厂的兴衰到见证798的转型,这个大院在他的生命里烙下了太多的印记。

庞成奎既是本次展览的参与者,也是程大鹏收藏之路上的关键人物。尽管时隔45年,庞成奎还清楚地记得,1972年1月2日,他第一次来到位于大山子的工厂大院报到时的情景。那时,原七一八联合厂的各个分厂已独立经营了七八年。

报到那天,天气很冷。道路两旁的松柏整整齐齐地排列着,树梢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白雪。他的心情却异常兴奋。在那个年代,要进这样的军工企业,“根正苗红”是最起码的要求。穿着工厂发放的劳动工作服,庞成奎走出去,都是“挺着胸抬着头,感觉到无上的光荣”。

在车间干了11年后,庞成奎开始走上领导岗位。上个世纪80年代,改革开放刚刚起步,七一八厂的每个车间都在加班加点生产着电子元器件。每天上午10点到10点15分是工间操时间,喇叭一响,各个小院子里都是工人做操的身影。因为人数太多,每个人领到的饭盆都编着号,到饭点时,他们得按照号码分拨吃饭。一到下班时,院子里就人贴着人,行走的人流中,不时会响起自行车清脆的铃铛声。

如今,铃铛声早已消失,798大院外贴着“共享单车禁止入内”的告示;曾经的工间操也早在1990年就取消了。现在活跃在院子里的,是来自全世界的面孔,他们年轻、时尚,带着艺术的气息。

因为多才多艺,既会摄影,又懂书画收藏,还玩体育,庞成奎先后成为研究所的工会主席和党委副书记。2006年,第十一研究所为了纪念建所50周年,准备出一本历史画册。作为牵头人,庞成奎开始向退休的老职工征集历史资料。他自己也通过不同的方式收集淘汰的设备、破旧的家具和当时的照片。

七一八厂首任总工程师罗沛霖原本是第十一所的所长。庞成奎每年都会去看他几次,因为共同的兴趣,两人很聊得来,慢慢结成了忘年交。从去德国考察到成立储备组,从建厂过程到与援建专家的沟通,罗沛霖都一一讲给庞成奎听。

知道庞成奎在收集历史资料后,罗沛霖就把自己拍摄的照片底片送给了他,甚至要把老相机也一并送他。渐渐地,他的办公室就成了“历史物件的集中地”。老庞说,这些物件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,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貌,也记录了一段历史,“有朝一日,一定要展现给大家”。

和程大鹏结识后,由于相同的收藏爱好,两个人越来越投机。日常交流中,他们不仅萌生了办展览的想法,还想着在时机成熟时办一个电子工业博物馆。

“那是一个向上的时代”

韩学志是本次展览的第三位参与者。现年63岁的他,退休前是798艺术区七星物业总经理,此次作为七星集团的代表组织展览。

韩学志说,展览举办近一个月以来,每周来参观的观众将近1万名。据他观察,游客大多被精美的电子仪器吸引,工厂职工常常在照片和历史资料处驻足。一些退休多年的老人也来了,他们看着墙上的员工卡片,落下热泪;企业组织在岗的职工来参观,很多人看到了自己父亲的身影;德国人来看,每个人都会收到一套德文版的关于七一八厂厂史的书。

见到韩学志时,他正带领着老领导——他在第六车间时的车间主任张业万参观展览。83岁的张业万1956年就来到了这里。那时,酒仙桥周围还是大片未开发的庄稼地和一条孤零零的土路。七一八厂还在建设当中,前来援助的东德专家还在工地上指导。

建国初期,中国的电子元器件生产一片空白。为了

国防事业的需要,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,来到这。条件很艰苦。工人们用的动力机械是毛驴木轮车。不管是工人还是工程师,办公都是把草席往地上一铺。施工的过程中,遇到人人发怵的冬季,也一天都没停过。

张业万记得,那会儿大家都争先干活,没有上下班的概念。有一次,带他的师傅正在食堂吃饭,因为太累,吃着吃着就睡着了。

“可大伙没有怨言,反而都很高兴,因为国防建设起步了。”如今,张业万已是满头白发。他说,那时,大家的想法比较纯粹,“没有强大的国防,就没有新中国的站起来。”

退休的老职工们,争先叙说着自己对那个时代的记忆:“虽然那时候很苦,可是大伙的劲都往一处使”“大家都很自觉加班加点,要求进步。好像身上总有使不完的劲”;

“1958年时,一级工每个月的工资是35.5元,干部的工资是38元,大家区别不大”“那时,人心比较真诚,干部与工人、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也纯朴”。

在没有任何技术基础的条件下,全体职工用超常规的设计和建设速度,平地而起建成了七一八厂。建成后,它就跃升为当时全世界技术最先进,规模最大的电子厂。

长安街上的音柱,人民大会堂的话筒,中国第一台真空管电子计算机的记忆磁芯、作为压电晶体器件原材料的人造水晶以及用于雷达、遥感、导航等领域的微波铁氧体器件……七一八厂生产的电子产品被运往全国各地,用于各个重要领域。

到1964年,七一八厂生产的“友谊”牌元器件产量,已占全国总产量的1/4,军品的1/2。七一八厂连同1954年苏联援建的七一五厂,共同撑起了全国电子元件市场的半壁江山。从这里还走出了一大批日后支撑中国电子工业发展的科技骨干。

2007年,在七星集团50周年庆典上,七一八联合厂首任厂长李瑞在回顾工厂的创业史时,把那个时代全体职工的精神总结为“创业家精神”——不怕苦、不怕累、愿意经受一切的拼搏精神。

而这也是此次展览的主题。大量的照片和资料都在诉说着,“那是一个向上的时代”。

“没有过去的艰苦奋斗,就没有今天。要教育年轻人接好班。”张业万说。

“这就是工匠精神啊”

第二次见到程大鹏,是在他平常工作的场所——798艺术区内一间450平方米的大厂房。

厂房的深绿色铁门上写着“国营七一八联合厂文献委员会暨文献资料征集办公室”几个大字。进入室内,在每个房间里,都可以看到整齐排列的深棕色大木架,木架上摆满了他收集来的电子仪器。它们几乎都来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德国、瑞士以及北欧的国家,或黑或银或白,尽管颜色不一、形状各异,但都被精心呵护。

这些仪器不仅反映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工业生产水平,也见证了中国社会特殊时期的艰辛。虽然,现在早已有替代这些精密仪器的新技术,但“它们的美学价值和历史价值都是不可替代的”。

这还只是程大鹏所有收藏的20%。更多的东西,存放在好几个巨大的仓库里。有的是老职工赠送的,有的是花钱购买的,有的是从垃圾堆里捡的,还有的是“以物换物”换来的。

此次展览中,有一台上个世纪40年代出厂的卡尔蔡司倒置金像显微镜照相机,2米多长,吸引了很多参观者的目光。

这款照相机,中国当时就进口了三四台。一位70多岁的相机收藏家手上就有一台。程大鹏得知后,花了一年时间与他沟通,最后用一套莱卡套机换来了这台仪器。

“太棒了!”程大鹏反复赞叹道,“对于那段历史来说,这太珍贵了。”

这台相机做了大量的美学设计,无论是油漆、金属还是颜色,都分了好几个层次,各自按照某种美学原则出现。更让他感到震撼的是,这台仪器上的上百个螺丝钉,最后拧完时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——右上方45度。“我们现在不是提倡工匠精神吗?这就是工匠精神啊!”

最初,程大鹏只是从设计和美学的角度,来欣赏这些工艺品。随着收集的东西越来越多,他开始对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产生浓厚的兴趣。

有一回,一个老厂房拆迁。有人给他打电话,让他去看看。厂房的门一打开,地上一片狼藉,飘满了各种证件和档案,诸如结婚证、介绍信、私人日记本、文件袋等等,“不仅保存了大量那个时代的生活痕迹,还保留了当时工厂的技术管理细节”。此外,厂里还留下了大量被废弃的老设备和家具。

最后,他购买了厂房里所有的东西。

有一次,程大鹏收到了一个棕黄色木盒,木盒里装着一台光学仪器。这是一位工厂老职工的儿子骑着自行车送来的。这台仪器跟了他父亲一辈子,总舍不得扔掉,“说免费赠送给我,希望展览时能看到它。”

刚打开盒子时,里头积了厚厚的灰。程大鹏用扫帚清扫掉表层的灰后,再用植物油擦洗,木盒内层便显现出锃亮的明黄色。机器很精致,而且和盒子的设计严丝合缝。“很多老设备在工厂关停、设备升级到中,被扔掉了。现在完全是电子化的设备,已经看不到这样工艺品般的仪器了。”

上个世纪90年代,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涤荡下,七一八像许多其它国营企业一样,告别往日的辉煌,陷入困境、没落和衰败。最困难的时候,各个分厂基本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,70%以上的车间停止运行,职工从2万人减至不足4000人。

也就是在那时,这位老职工下岗了。这台机器曾承载着,他关于这个工厂的所有记忆。

一个传奇的故事

胡光记得那段动荡的岁月。作为七星集团生活物业经营部部长,他高中毕业后,就在1977年来到了七一八厂,见识过后来企业发展变迁的整个历程。

在他的记忆里,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景象:1979年还在计划经济的尾巴,工人们只管蒙头生产,不管能否卖得出去;

1986年以后,乡镇企业开始兴起,七一八厂的技术员们很多都去这些小厂兼职,因为给的工资高,见面时,互相的问候语是“又到哪里‘抄肥’去了”;

1990年以后,七一八陷入低谷,社会流行下海创业,收入比在厂子里高10倍以上。有技术的纷纷出走,一个30人的班,走了将近一半;

到了1998年,国企改革浪潮中,工人纷纷下岗、分流,没技能的去当了保安,会开车的做了出租车司机,有手艺的去给人修BB机、大哥大和传真机。

作为所里的技术骨干,胡光当时负责一台专业设备的运行。在北海经商浪潮跟汹涌的时候,领导来做他的思想工作,让他无论如何都不能走。而这一留,他就一直待到了现在。

他负责的那台设备叫双靶测试仪,是东德援建七一八厂时配备的一台重要测量设备。它可以通过测量磁滞回线,快速地测量出磁钢的剩磁、矫顽力和最大磁能积,从而为磁钢的生产提供准确的参数。而磁钢是制作电子元器件的核心材料。

全国仅此一台。

这台设备测量的数据甚至被作为国标。要是这台机器坏了,整个电子元器件行业都可能乱套。有一回,其他电子厂的领导来到七一八厂,想要拆开这台设备进而仿制它,被阻止了,“万一恢复不了,怎么办?”

1985年,这台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坏了。专家们都没辙了。要修复它,就得拆开它,然后重新给它缠上线圈。那可是0.09毫米粗的线圈,修复的人要在一个小指头般大小的机子上,绕上3000多圈。“这要求手上不能有汗,而且眼神要好。绕的时候,得非常仔细,容不得一点差错。手劲还得均匀,不能太紧,也不能太松。”

没有人敢动手。当时还是一名普通技术员的胡光,主动请缨了。平时就喜欢研究机械的他把设备拆开,经过3天的奋战,又重新给它缠上了线圈。设备完好如初,又能准确测量了。

因为这个,他被评为了当年工厂的优秀生产者,后来又被评为北京市的优秀生产者。一直到他提干、分房,修复仪器都是重要的加分项。

“就是自己喜欢,又有点机械知识。领导也支持,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嘛。”被问及成功修复的秘诀,胡光笑了笑,“而且那会儿年轻,眼力好。搁现在,我肯定也修不好了。”

“这是一个传奇的故事。一个高中生用最简单的方式修好了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仪器。”程大鹏很想把这台设备也搬来展览,但听说稍有不慎,就可能破坏这台机器后,他才作罢。

从七一八建厂至今,这台机器一直在使用,现在还在发挥着作用。

以798艺术区的面目重生

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起,七一八厂的境况就已大不如前。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万人厂逐渐荒凉,终于不得不开始出租闲置厂房了。

1995年,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雕塑家隋建国接到了纪念抗战群雕《卢沟桥抗日群雕》的任务。那时,美院搬到酒仙桥地区,他们需要一个大大的工作空间,就在原七一八联合厂三分厂798里,找到了一个3000平方米的闲置仓库。

此举开创了798艺术创作的先河。群雕任务完成后,美院老师们继续在这里租房子搞创作。



程大鹏(右)给参观者讲解展览。



退休职工在员工卡片处驻足。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



此次展览展出的卡尔蔡司倒置金像显微镜照相机。



798艺术区一角。东方IC供图

2000年年底,经过企业调整,798、706等6个工厂合并为七星集团。资产重新整合后,大部分产业根据发展需要搬出了大院,更多的厂房闲置。七星集团将这些厂房陆续租了出去。

如今,伴随着中国向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步伐,对高技能人才的渴求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一道景观。在整个社会都呼唤工匠精神的当下,作为798不为人知的另一面,七一八被重新翻出,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。

程大鹏至今依然记得,第一次来到798时的场景。那是2003年的一个夏季夜晚,在一间咖啡馆的二楼吃完晚饭后,已是8点多。白天机器的轰鸣停了,熙攘的人群走了,只剩下空寂的街道和巨大的厂房。

漆黑的夜色下,安静得只能听见野猫的叫喊。本版照片除署名外,均为受访者提供,其中压题图为七一八联合厂刚建成时的全景图,其规模和现代化程度都代表了当时中国工业的最高水平。



更多精彩内容,请扫描二维码。